

我的40年

难忘复校第一课

■ 张家驹 文

4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在文革后期被撤销的空军政治学校奉命复校,被借调到空军政治部宣传部工作的我从北京归来。经过十年折腾,重执教鞭返回教坛。春天,又来到我心中。

政治学校复校第一期,从部队招收1300多名轮训学员,分12个学员队,还有一个教员队。那时,学校实行教员住队制度。第一门哲学课一开,我就把铺盖卷搬进5队(干事队),与学员同吃同住,实行“星期六制度”,即每周六才可以离队回到近在咫尺的家里看看,周日下午返回学员队里。

粉碎“四人帮”以后,百废待兴。当时理论界的当务之急,是纠正文革时期盛行的凭主观需要,断章取义地肢解革命理论的学风,大力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宣传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复校后学校根据轮训政工干部的需要,首先强调的是“正本清源,学马列原著”。那时政理教研室的哲学教员总共5个人,时间紧,来不及备课,一个教员讲课,几个学员集中在礼堂内听大课。其他教员已备好了前几课,我来得晚,排课时只能排在最后,分工我讲的是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简称《费巴》)最后一章第4章。

那时讲原著,采用“诵读”的方法,即逐段逐句地解释原文,提炼出其中的中心思想、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等,再联系实际运用原理回答实际问题。《费巴》这本书我过去看过,但没有读懂,光是从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那句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中推导出“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的辩证法思想,就够搞脑子的。

以己“昏昏”,焉得使人“昭昭”?我只好一边学,一边写讲稿,细抠原文,反复琢磨,参考了好几种版本的解释《费巴》的书,比较各种解释,重新组合成自认为“说得清楚”的一种表述,写进我的讲稿。遇到书中诸多的名词、人名、哲学史上的典故和历史事件,还要翻找各种资料和辞典,这样,备课的进度很慢,而单门独进的课程进度天天朝前赶着,又逼我加速,我总不能临了在讲台上“砸锅”吧!所以,讲稿写了又改,改了再写,白天随队听课,忙于实施各个教学环节,夜间关起门来加班加点写讲稿到深夜,是常有的事。

1978年5月30日,是我重返讲台的第一讲。在政校二院礼堂内,进入第一批次教学的500多位学员,齐刷刷地端坐在长条椅上。一位熟悉的学员队干部递给我4句打油诗,祝家驹马到成功!

等待上课铃声响起,值星的学员报告到课人数,敬礼完毕,我登上讲台,环视底下黑压压的一片,顿时来了精神,一共8个小时的课,一上午讲了4个小时,台下来一片热烈的掌声

告诉我,开头一炮,还行!

次日上午,继续在礼堂讲剩下4个小时的课。我的肚子不争气,腹泻已经好几天,到卫生处找医生开药服用,仍止不住,真怕上课时间出洋相。讲课中有两次课间休息,我已跑了两趟厕所,可是讲到最后一节课时,我最担心的一幕还是出现了。其时,我口中滔滔不绝,可是不争气的肚子一阵一阵的抽痛,腹压一股劲地往下窜,眼看就要忍不住了,曾几次已经到了想“中断讲课”的边缘,但转而又想,政治学校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糗事,台下的学员来自全空军,“教员上课跑肚”,传开了那真是天大的笑话!不行!我涨红着脸,强忍自己集中注意力,硬是把讲稿上的内容全部讲完。等我宣布下课,话音未落,就直奔后台。还好,出礼堂后门二十几步就是“救命”的厕所。

住队的学员队干部发现了我的狼狽相。等到午餐从食堂出来,指导员刘炳义就扶着送我到卫生处,医生诊断结果是急性菌痢,需要立即住院。

我一听要住院!那怎么行呢?我的课刚讲完,接下来还有组织讨

论、问题解答、小结、写心得体会等等一大堆事。

医生坚持菌痢传染性强,必须立即隔离。不得已,刘指导员帮我立即召集各分队长开会,由我向他们详细布置了下面几个教学环节要做的几件事和注意事项。会毕,卫生处派的车已等在外面,直送空军455医院眉州路传染科。临行前,我委托刘指导员通知我家人把洗漱用具送到医院。那时,家里没有电话。

我躺在医院病床上,心还挂在学员队。队里没有了住队教员,谁来组织教学呢?只有教研室临时抽人帮忙了。说来也巧,同病室早先来的一位病人是政治学校送来的学员,原八航校的一位政治指导员,叫王俊杰。那时的学员学习很刻苦,他带上《费巴》原著住院,正为看不懂,听不上课而发愁。正好,讲《费巴》的教员来了。我给他断断续续讲了两天。因为我刚讲完这一章,讲得相当详细。病房里师生一对一的补课,在医院一时传为佳话。这件事后来被人写了稿子,

登上了《空军报》,题目是《辛勤的园丁》。

旅游日记

迎面吹过来大海风

■ 赵文心 文

盛夏的午后,一踏上上海第一岛城嵊泗,老电影《渔光曲》的主题曲便浮上心头。

迎面吹来的海风,裹挟着大海的咸腥潮汐,湿漉漉,沉甸甸,悄无声息地包裹周身,摸一摸手臂脸颊头发,粘粘的一层渍人。沿山路驱车,夹道皆种植枝叶油绿繁茂的夹竹桃,高大壮实如墙,零星红花点缀其上。导游说夹竹桃不惧海风海雨的咸湿侵蚀,易栽易活,花期又长,盛开时岛上四处红灿灿的,与摇曳的芦苇白穗相映成趣,可惜正开得热闹的花朵都被前几天的台风刮落了。是了,嵊泗岛位于长江口和杭州湾交汇处,一旦有台风生成过境,其威力可想而知。

办完入住手续,拖一把藤椅坐在半山木屋前,看黄昏的海,黄蓝相间,海波温和平静。看山麓的云雾,近乎透明的白色,仿佛正缓缓自海上升腾,时而丝丝缕缕起伏飘荡,时而厚重绵密遮蔽了漫山绿茵。我是第一次上海岛,贪看不已。在屋外坐久了,周身湿凉,山岚愈发浓郁,月亮一直不肯出来,星星也找不到。服务员大嫂打着呵欠好意提醒,岛上湿气重,洗好的衣物不易干,记得出太阳时赶早晾出来。

却没想到太阳出得这么早。夜里有些隐约的涛声,睡不踏实,四点多便醒来,见门边透进白光,拉开窗帘,天竟大亮。海天相接处,淡橙色云霞晕染铺洒,太阳已跃上云端。嵊泗,这个浙江最东部岛屿的早晨果然印证了“太阳从东方升起”。

晨光已有些灼人,海风没有丝毫凉意。等着集合环岛游,看见山腰的一棵高树,挂满圆果子,青皮有果蒂,形似核桃,旁边几株矮树,长着掌形叶片,顶端中心有一簇簇果实,硬而大小,皮色隐隐泛红,是野生无花果吗?向服务员大嫂打听,却说不所以然,见我疑惑,又解释“奶奶那辈人穷,要吃野菜,山上的东西都认得的”。

再问导游阿四,说高树的果子叫“杜冬”,是药材,但用处不大,岛上专门采药的人也不要;小果子是“野枇杷”,分两种,像无花果的,有毒,不能吃,另一种皮色发黑的,掰开是白色的果肉,味微甜,小时候当零嘴吃过,“以前苦,

现在没人注意这些植物了。”他还打个比方,“就像爷爷辈驾帆船打鱼,只能在岛屿周边转悠,现在,大船可以去太平洋深海作业了。”看着山麓遍布的形态各异的植物,觉得这比方哪儿不合适,一时无从辩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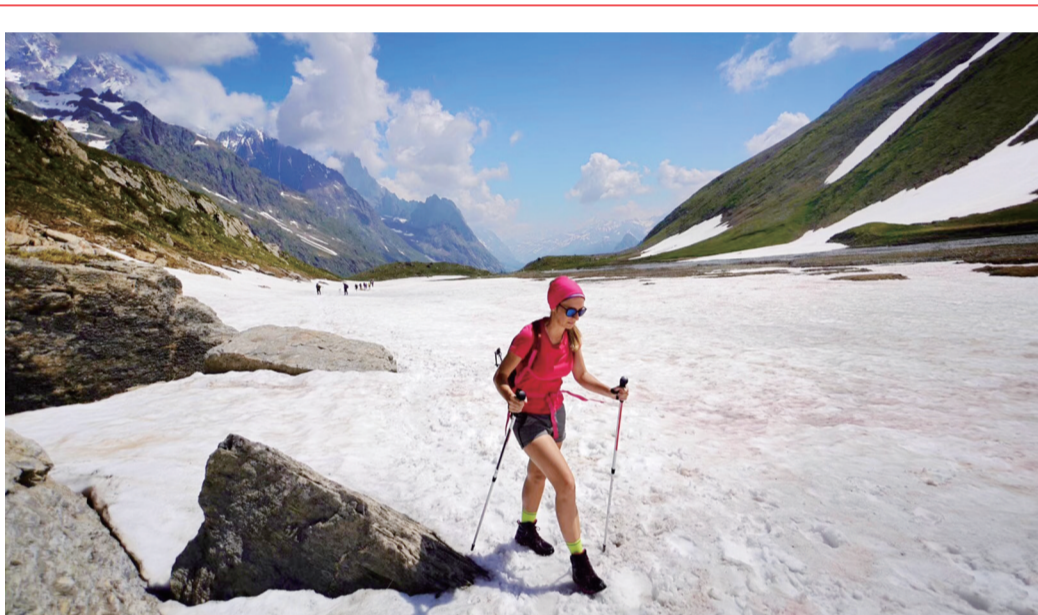
四十岁上下的阿四是土生土长的嵊泗人,瘦而高,大眼挺鼻,口音近宁波人,小学毕业后,打鱼,挑脚,码头装卸,当厨师,开出租,踩着海岛经济开发的节奏变换谋生的职业,如鱼得水,能说会道。阿四领我们在海边攀爬,看浪花咬噬嶙峋礁石,激起漩涡湍流;下海滨浴场,一排排海浪此起彼伏,不知疲倦,不容避闪;去马迹山观景台看上海宝钢矿砂转运场,惊叹现代工业的吞吐运转能力;逛农贸市场,各色海鲜装盛在冰盒里,比上海卖得贵;上防浪堤,阿四一一指点筑堤的多边形方堆、阻挡海浪的拒马、晾晒的绿色尼龙渔网、海边耸起的座座楼盘;解释打鱼用的铁锚,会随潮汐转动渔网,保证不论何时鱼皆入网;见我们好奇小广告“割叶子”,阿四说“叶子”是渔船螺旋桨的俗称,休渔期渔民需要清理“叶子”上缠绕的海草、牡蛎、渔网等物。

“那一片,还有这一片,都是填海的新地。”防浪堤蜿蜒围成半弧形港湾,经年淤泥堆积,水深变浅,就填海为地,建设新城。海风鼓荡,阿四的话语中充满自豪。

岛城的未来,正迎八面来风,“发扬海洋资源和区位优势……积极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但我略有些不安。早在新石器时代,嵊泗岛上就有先民栖息聚居,春秋战国时,已是舟车辐辏,人欢鱼跃的海上乐土。当我们迫不及待地往前赶,会不会视悠久的传统为过时,将乡土的资源抛在脑后?刻意在城中植大片绿地,养护花费不菲,却缺失乡土教育,不爱护山麓上的原生植物。有远洋捕捞的能力,近海的污染却不抓紧治理,长此以往,海洋资源也将枯竭……

希望这些不过是一个浮光掠影的游客的多虑。

文苑投稿邮箱:
zfk@vptimes.cn, 欢迎投稿



勃朗峰攀登者 ■ 郭南强

杨浦记忆

松花新村:我的一件历史“行李”(三)

■ 刘翔文

现在我再介绍下东松花和西松花中间的这片空地吧。随着孩子们经常在那里踢球、摔跤而“演变”成了运动场,而大人们也逐渐在茶余饭后,拎着小板凳聚集到这里“嘎山湖”。以后长白街道也看中了此地,把它作为露天电影院,经常来放映一些《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之类的电影。无形之中这片空地就成了“市民文化活动中心”。

其实此地原是一片稀疏的绿化带,它把松花新村一分为二后,也就成了东、西两个松花的分界线。那时,东松花和西松花的“两个阵营”是泾渭分明的,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每当别人问起住在松花哪里时,都会脱口而出,我是东松花的或是西松花的。而到了文革时期,这里竟然成了流氓阿飞打架和“文武斗”的斗殴场,不时地会出现一些刀光剑影的场景。所以这时期,松花新村的孩子们,在大人的严格看管下,再也不敢随便去这片空地玩耍了。

和孩子们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不同,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松花新村大人们开始忧心忡忡起来。每天下班回家后总是愁眉苦脸。原来,这时国家发布了支援内地社会主义

建设的政策,简称为“支内”,上海机床厂对口支内单位是陕西省汉中机床厂与宝鸡机床厂。组织上一旦定下哪个职工去“支内”,那就是连“根”一起拔,其本人和全家都必须把上海户口一同迁入陕西。因此,大人们整天都在担心自己是否会轮到“支内”。

我父亲没有去“支内”,否则我现在可能就是陕西人了。可是,我的好多小学同学随同父母一起挥泪告别上海的故土,远赴汉中或宝鸡,一呆就是几十年。至今我还清晰记得,住在我家楼上的一位姓李的小学同学,他是个小儿麻痹症患者,六十年代此病非常肆虐,其父亲和我父亲在一个车间工作,是第一批被指令去宝鸡机床厂支内的。他们举家迁往宝鸡,告别上海的那天,我的这位同学在父母的带领下来我家道别,他拄着拐杖的身影和茫然的眼神,如今想来,依然令我难以忘怀。

虽然后来大部分支内职工退休后,陆续回到了上海,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上海的支内职工把“根”永远扎在了陕西的黄土地上。我们家在松花新村一直居住到我小学毕业,以后随着弟妹的陆续出生,我家也就成了住房困难户。七十年代中期,上海机床厂将我住房分配到面积更大的长白新村后,我们便搬离了松花

新村。回想起来,居住在松花新村的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一个各类生活资源短缺、家庭经济不富裕的年代,但老百姓的心灵却十分单纯。

今年春节,我们祖孙三代十一口人四个家庭组成的大家庭的年夜饭,就是在松花江路靠近松花新村的一个饭馆吃的。当夜,我悄悄独自溜出饭馆,漫步在寂静的松花江路上,凝望着夜幕下的松花新村。今天的松花新村和松花江路已经物是人非,原先的三层楼尖顶房,已经加层为四层楼的平顶房,四周也砌起围墙作了封闭式管理。和周围一幢幢耸立的商品房小区相比,松花新村真的是“老态龙钟”了。

可是,新村老了,路灯亮着;街巷睡了,时间醒着。

有位历史学家说过这样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对一座匆匆前行的城市来说,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一件行李。”我想:对上海、对杨浦区这样一座正在不断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城区,对曾经在松花新村居住过和现在依然居住在此地的每一个上海市民来说,松花新村是永远“寄存”在我们心灵深处的一件历史“行李”,无论走到哪里,都“携带”着这件“行李”,去迎接、去拥抱更加灿烂的明天。(完)